

578.1
0013
1

爲甚麼我們要擁護蘇聯

庫西寧作
靜純譯



— 8 —

知識書店印行

一九四九年八月

伏蘇

578.1/0013/1

為什麼我們要擁護蘇聯

一九一七秋，資本主義國家的百萬工人，熱烈歡迎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之勝利和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之建立。在帝國主義列強政府組織反蘇軍事干涉時，英、美、法及其他許多國家的工人，都起而反對這一罪惡的侵略而聲援年青的蘇維埃國家。

從那時起，驚慌失措的反動資產階級，宣佈同蘇維埃國家有聯系為死罪。差不多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開始殺害和追究蘇聯的友人，首先是共產黨員、革命的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組織和同蘇聯的友好協會等等。

最反動的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間，曾企圖用流血的恐怖和兇狠的壓迫，瘋狂地試圖消滅所有對於蘇聯積極的和忠實的友人。不僅德、意、日的法西斯惡棍，而且波蘭的保安隊，芬蘭的秘密警察，羅馬尼亞的憲兵及其他各種各樣的蓋斯塔波，都不間斷地追逐工人運動的先進人士和進步的知識分子。逮捕和蠻橫地拷打勞動人民成羣的優秀兒女。因此二十世紀的檢察官對他們面前的犯人，所提出的有決定意義的問題，照例是：——你是擁護或是反對蘇聯？

資產階級審訊室的牆壁可以證明：這個問題怎樣經常在鼓動派拷打的囚犯心中，喚起特別英勇堅定的血潮。他們知道：他們個人的命運是繫於這個問題上的，只要他們說出一句反對蘇聯的話，就

可以將自己救出苦難。可是他們高傲地承認自己對於蘇聯的信仰。

這種精神——思想上的堅定性，意識高度的勇氣從何而來的呢？在我們的敵人看來，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現象，一種奇怪的「幻想」。任何時候也不曾有過某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成爲他國公民如此愛戴的對象。

正是因爲蘇維埃國家，不僅是在基本上區別於以前所有的國家，而且是數世紀以來，先進人士的優秀頭腦所理想之崇高的有歷史意義的目的之期待已久的實現。各國有政治覺悟的勞動者知道：蘇維埃國家乃是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乃是人類進步力量的先鋒隊，其使命在於實現以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代替剝削的資產階級社會之全世界有歷史意義的改革。

蘇維埃國家之存在本身，即鼓舞着爲從剝削階級壓迫下解放而鬥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最先進的勞動者，共產黨員和誠實的社會主義者，當其意識到在推毀帝國主義和國際反動勢力的鬥爭中，現在有了社會主義已經戰勝的偉大國家作爲堅強的支持時，他們獲得了社會主義一定勝利之特殊的信心。

因此，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之深刻信仰，同他們對於蘇聯之相等的深刻信仰，是分不開的。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或社會主義者，無論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反對蘇聯，是絲毫不足爲奇的。因爲他認爲蘇維埃國家是社會主義的祖國，他愛護他。他怎麼能反對這樣的祖國呢？一個誠實的人怎麼能背叛社會主義的祖國呢？

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起，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就要求社會民主黨站在反對蘇維埃國家，反對蘇聯工人運動之任何聯系的堅決立場。很早以前就努力向資產階級，表示他們對於自己的均

主人毫無管處，反而有利無必的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領袖們，這時開始極力宣傳自己對於反蘇反共鬥爭的決心。使他們社會民主黨成爲「治階級在社會上的基本支柱，他們本身成爲統治階級的政治奴僕，他們爲了高官厚祿而出賣了自己。」

但不久，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表現沒有能力制止工人廣大羣衆轉到共產主義運動方面來。大家知道：首先是意大利，而後在保加利亞、波蘭和德國形成了這種形勢，在反動的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藉助於社會民主黨用民主議會的方法，來保持政權時，就採取了法西斯獨裁的恐怖制度。

在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最兇惡的敵人，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國取得政權之後，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反動資產階級，都將自己的希望寄託在德國法西斯的反蘇侵略上面。英、美、法的帝國主義者，日本、意大利更不待說，都盡其一切力量幫助德國法西斯準備戰爭。但衆所週知：他們協同組織反蘇「十字軍」的一切計劃，在一九三九年不得不加以「檢討」。一方面：蘇聯的外交政策，及時地揭穿了這些計劃。另一方面：所有參加慕尼黑陰謀的國家，都陷於帝國主義矛盾的交織衝突之下，這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基礎理論，關於在資本主義頹危變化的條件下之世界歷史的動力量的法則中所預見到的。

一切帝國主義所準備來反對蘇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上，在歐洲是以最具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法西斯），反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戰爭而開始的。在德國攻擊了波蘭，日本襲擊了美國後，才形成了巨大的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聯合國機構。之後，在戰爭的進程中，英勇的蘇軍摧滅了德國法西斯及其同盟國的基本力量，法西斯侵略者才一敗塗地。

這樣，歷史的實際過程：澈底地「在鬥爭中戰勝了」社會主義的敵人——帝國主義完全明顯地證

實了歷史的老經驗，當瘋狂的反動派——沒落的社會制度的代表——在準備消滅進步的社會力量的「總攻擊」時，照例必將引起猛烈的歷史進步潮流的加速的突破（經由這個或那個河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國際陣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但未曾削弱，反而強大數倍。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國際陣營在戰後，其隊伍中失去了像德、意、日法西斯那樣強大武裝的核心。不但如此，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俄國脫離帝國主義體系一樣，現在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也脫離了這個體系。東歐和東南歐各國，在推翻了同外國帝國主義有聯系的國內反動派，實現了所有大工業收歸國有，清算了地主土地之後，變成了人民的民主主義的國家。

所有這些國家，都是被蘇軍從德國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僅這一條件，就足以成爲蘇聯在這些國家中獲得巨大聲望的基礎，成爲廣大勞動羣衆對蘇聯埃人民之深厚謝意的基礎。反動的資產階級黨徒和右派社會黨的公開反蘇立場，只不過加速了他們的政治孤立和選舉時的慘敗。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的人民羣衆，在戰爭和被佔領期間，每天都看見，而且根據經驗知道：誰擁護蘇聯，誰就維護自己和祖國的光榮；誰反對蘇聯，誰就是祖國的叛徒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因此，在國家被解放後，膽敢提出反蘇口號，或在此以前就以敵視蘇聯而出名的政客之遭受勞動羣衆的憎惡鄙視，是完全自然的。

現在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只有某些自暴自棄的破落戶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走狗，才公開提出反蘇的號召。一切黨派、團體和慎重考慮人民羣衆之支援的領導者，全都號召同蘇聯的合作和友好。這是非常重要的事實，它多半反映出完全真誠的政治傾向。在新民主主義國家中，除南斯拉夫外，那裏

也沒有根據以懷疑負責政治領袖們的親蘇聲明。

恰如蘇俄共產黨情報局六月會議所指出：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脫離了黨的國際主義傳統，而走
上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迷失了馬列主義的道路，在新民主主義的條件下，執行了基本上不正確的機會主義路線。

不可忘記：新民主主義，是從資產階級國家走上社會主義國家，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過程中
的過渡階段。任何一個國家，也不能不進不退地長時間停留在過渡階段上。如果它不前進到社會主
義，那末它將後退到資本主義。但向社會主義的發展，並不是盲目自流的。一個國家能否真正向社會主
義前進，繫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繼續發展和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之下的國家正確的政治方向。

南斯拉夫的領導者，却專向消滅階級鬥爭。他們裝作好像在南斯拉夫，階級鬥爭，已經沒有嚴重
的意義似的，特別是在農村中，他們忽視了階級分化和資本主義根深蒂固地生存在僑民民經濟之
中。他們恰如「農民社會主義」的舊噶心論者一樣，認為如果爲了這個目的，在禮拜六把那以富農制割
者爲首的「所有農民」召集來，下一條適當的佈告，就可很容易地消滅資本主義之根。有別無產階級
領導權的列寧學說，在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看來，是可以置之不理的空談。

站在消滅階級鬥爭的觀點上，在現行的南斯拉夫人民陣線方面，也產生了妥協的策略。人民陣線
的組成，不僅包括工人和勞苦農民，而且有富農、商人、工廠主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甚至包括某
些資產階級黨派在內的各種政治團體。在這個五花八門的聯合中，領導者企圖不顧一切地避免產生分
歧的原因：不準備展開工人的階級鬥爭，因爲廣泛聯合的部份參加者反對這件事務；放棄共產黨的領

導作用，甚至隱蔽黨的面貌，以使聯合內非共產黨的參加者，任何人都不能憤怒、隱微和縮小同黨聯的合作，因為聯合內某些資產階級參加者不贊同這種合作。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者，對於這種傾向採取放任時，發生了政治路線上的危險脫節，本來應該依靠人民陣線的多數，依靠工人同盟中的同盟，領導勞動者的事業前進，而他們主張向政治上最落後的人民陣線的小資產階級成份妥齊。換句話說：聯合的政策，是建立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上。

雖因基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那麼，不言而喻的，誰就將討厭自己的國家同意維埃國家的自由合作，儘管這種合作，對於自己的國家有多大利益。當然，這種人也可能利用機會公開聲明，希望本國公民同蘇聯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聯繫，但在實際上，他將竭力限制這種聯繫至最小限度。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也使他傾向這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經常用敵詐的威脅，來恐嚇弱小獨立國家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想要弄妥協手詭，避免這種壓迫，向帝國主義讓步，以求得它們的歡心。第一步帝國主義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領導者所提出的讓步，就是要求他們同蘇聯的關係，不應該比他們對待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更好。

南斯拉夫領導者的行爲，就是這樣。他們在實際上對於蘇聯和聯共黨，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污蔑蘇聯軍事專家，不客氣的對待蘇軍，對於蘇聯在南斯拉夫的公民、專門家和一些正式代表們，則設立專門的監視和訂刑制度。南斯拉夫的領導者雖然公開宣言，聲明自己對於蘇聯的特殊友誼，但實際上對待保衛新民主主義國家之安全與獨立的蘇聯的實質關係，却與對待威脅其獨立與安全之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毫無二致。

總括南斯拉夫的這種反蘇態度，確實意味着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巨大讓步。諺云：得寸進尺，由于現

在南斯拉夫領導所執行的政策，將使南斯拉夫陷入怎樣的危險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但這極有害的政策，能夠不引起南斯拉夫共產黨和勞動者的嚴重反抗，而長久地繼續下去，也同樣是不可想像的。

南斯拉夫的勞動者，根據切身的經驗，知道蘇聯人民的弟兄般的援助，在保證他們的福利上，在爭取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上，及國家的經濟文化和國防力量之迅速全面發展上，是無法估價的和必需的。因此，勞苦大眾不難了解，任何削弱或限制同蘇聯合作的步驟，不管怎樣巧妙的詭辯，其本質都是破壞人民民主存在之基礎的。只有在以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首的統一的民主的反帝陣營裏，新民主主義國家，才能保證自己的獨立與安全，保證自己的整個前途，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分割，還有誰不明白呢？

這樣，在這些國家的勞動者看來，同蘇聯的合作，已經不是爭論的問題，而是一種深刻的確信。因此任何試圖持反蘇政策的人，當工人問道（如果不是今日那末就是明天）：

——你是擁護或是反對蘇聯？那時他註定要失敗的。

因為，那些認為忠實于蘇維埃人民之友誼為天經地義的勞苦大眾，能滿足于同事實不相符合的嚴厲的答覆，是不可想像的。

由于蘇維埃人民反對法西斯德國及其同盟國之英勇解放鬥爭的結果，即在西歐各國，也增加了對于蘇聯的真誠友誼和合作的情緒。

大家都還記得：法國和其他被德國所征服之國家的人民大眾，如何以搖籃不出的狂歡來迎接蘇軍對于希特勒德國所吹響的大軍之偉大勝利的消息。歐洲人民從反希特勒同盟各國中看出：只有蘇聯能

够燬滅和真正懲滅了人民自由之勃敵的基本力量。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將繼續從法西斯奴役下拯救出來。

同時，這些國家中，想參加威德曼佔領地的人民大眾看見了在所有政黨中，只有共產黨才有能力在國內組織和領導地下工作和游擊鬥爭。在戰爭期間，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事實上放棄了當地的處于危險之中的工作，他們逃到國外的某些地方，進行着政治勾當。許多法國和其他國家有名的社會主義者，跟隨大資本家和反動政客之後，變成了德國法西斯的幫兇和卑鄙的奴僕。但是忠實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運動之當地的優秀積極分子，却同共產黨員攜手並肩，爲本國之解放而奮鬥。

這就是說：共產黨員和左派社會主義者——他們都是向蘇聯合作的堅決擁護者——在偉大的考驗中，表現得最熱烈、最勇敢犧牲的愛國志士。他們保存了本國的光榮。

國家獲得解放後，在法國社會黨員之中，想同共產黨合作傾向如此廣泛，以至於在該黨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之代表大會上，不顧右派的反對，通過了同共產黨談判，建立統一政黨的決定。如果真正統一了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力量，那怕只是友好的堅固的選舉同盟，那末，這個同盟，無疑地，就能在一切選舉中贏得多數而將國家導向於真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這種威脅上層資產階級之權力和特權的前途，立刻引起全法國反動頭子們「二百家族」的反對。他們用盡一切手段，使社會黨拒絕同共產黨約統一。獨佔資本的代理人要求：無論如何要分裂工人運動。以勃魯姆爲首的右派社會黨人，費盡一切力量來達到反動資產階級的這個要求。國際反動派也在支持他們。美帝國主義者對法國工人運動之分裂，都極其關心。倫敦工黨中央，特地派密使來到巴黎，以便對社會黨加以制壓。

結果：分裂工人運動的黑暗勢力，在法國戰勝了。社會黨拒絕了同共產黨的一切合作，拯救了「

「二百家族」的統治。

分裂政體頭子勃魯姆，不僅一次地指摘：共產黨同蘇聯的聯繫，就是他認為不能同共產黨合作的原因。按他的歪曲說法；如果共產黨拒絕了蘇聯，那末就沒有什麼障礙可以妨害合作了；勃魯姆企圖用這種解釋來隱匿他自己對於法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叛變，但實際上他反而露出了自己的馬脚。因為，全世界的情勢已如此明顯，無論在那裏，如果不同蘇聯合作，那他就不會有真正的社會主義事業。要是中斷了同偉大蘇維埃國家的友誼，那末，在那裏也找不到可靠的支持，來保護本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反對外在的社會主義的敵人。如果反對以蘇聯為首的人民民主陣營，那就是幫助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帝國主義敵人。

勃魯姆應該了解其他法國社會黨員更清楚地了解，對於蘇聯的背棄和仇視，一定要走向完全出賣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整個利益。勃魯姆所領導的法國社會黨，已成為反動資產階級在反法國勞動者之階級鬥爭中的直接工具。該黨的部長們，為了保護大資本家的利益，對於要求多少提高其可憐工資而罷工的工人們，施以血淋淋的鎮壓。他們在去年秋天，組織過一次這種流血慘劇後，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又在克雷門弗蘭州重複這種暴行。當時，勃魯姆宣稱：「必須加強執行權」，因此贏得了較高樂黨徒和其他反動派的歡迎。他們根據這一聲明，認為勃魯姆甚至決心出賣資產階級式的殘存民主。但最能鼓舞勃魯姆的，是美帝國主義的計劃。他聲明支持倫敦決議，衆所週知：這一決議是預定將法國最富裕的地區——哥林州劃給所謂「西德領城」。他宣稱統地宣傳資本主義思想，說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同樣必須「犧牲本國的主權，來達成共同的目的。」

共產黨人則是竭盡一切力量，保衛法國的主權，和在經濟上、政治上的完全獨立。恰如以前面臨

德國威脅一樣，現在面臨日益增長的美國威脅，生活本身證實了那些由於同蘇聯合作，而被譏笑為不愛祖國的法國共產黨人，事實上是為了本國的自由，站在鬥爭的最前列。而那些誠實共產黨人的人，現在在美國保護下，參加破壞法國的獨立自主，不至於在德國「保護」下有名的法奸之賣盡氣力。

如蒙所週知：去年十一月，法國社會黨的部長們，甚至組織了反蘇警察挑撥，其目的顯然在取得企圖統治全世界的美國野心家之信任。這一切都表示：法國右翼社會黨人瘋狂地力圖使美國財閥的代表們認為：在法國設立美化的維希體制時，是找不到比右翼社會黨人更好的剝削的。

由美國人這方面看來，在目前的情勢下，不妨利用順從的社會黨人，但同時他們卻公然公開地鼓動法國反動資產階級，建立新的基礎——反動派認為較之社會黨更為可靠的法西斯式的最高黨組織。至於法國社會黨此後的命運如何，那只有看將來。可是今天大家已經都知道：社會黨在最近的兩三年中，已經失掉了工人的信任。社會黨領導集團之反蘇反共的立場，給該黨帶來復大的損失。社會黨失去了以前在選舉時的影響，許多的工人社會黨員拋棄了這個隊伍。

法國共產黨，則獲得了工人階級廣大羣衆的信任，取得了法國勞動者之最強大政黨的地位。在共產黨的面前，儘管有着無數的障礙和困難，但它並不懼怕爲實現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中之不可避免之困難。

法國基本的勞苦大眾，明顯地表示：他們不能被反動資產階級的任何走狗將自己從和蘇聯合作的大道上引入歧途。

x x x x x
英國的工黨，是在歐洲唯一自稱爲工人的政黨，它對於想加入英蘇友誼協會的任何黨員，都加以

階級黨籍之區分。這一事實：即可說明英國工黨對於蘇聯之關係。

不言而喻的：在戰爭期間，工黨的領導者，曾提出反對蘇聯，——在那時連邱吉爾也是如此。但在他們參加邱吉爾政府後，他們同邱吉爾是心照不宣的伙伴；他們共同為密計劃，以遲延開闢第二戰場和其他方法來削弱蘇聯。他們對於那些參加立即開闢第二戰場運動的工黨黨員，採取嚴峻的手段。在戰後和在英國國會選舉後，獲得了政權之勞動黨的領導者們，明目張膽地提出：在對蘇關係上，以超出老頭固的帝國主義者的意料之外的措施為其政治任務。他們大概認為：如果邱吉爾本人找不到理由，提出不滿和反對他們的基木外交路線，那就顯示他們工黨，得到了了不起的「勝利」，就沒有人能動搖他們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一切都按照這個計劃進行。工黨的部長們，噤聲了自己在選舉前改善英蘇關係的諾言。他們走向聯合美國反對蘇聯和新月民主主義國家的侵略同盟。英國同美國一起，企圖毫不容氣地干涉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內政，為了少數反動陰謀家的利益而施行鎮壓。英國同美國一起，有系統地破壞關於解除德國軍備和使德國民主化之雅爾塔和波茨坦兩會議的決定。工黨政府是金元外交「冷感」及其在歐洲貪婪無愛的擴張計劃之熱心的幫兇。

邱吉爾非常滿意。他曾再三誇獎邁貝文、艾特里的反蘇政策。美國的反動報紙也同樣表示歡迎。美國的進步民主運動領袖華萊士，在一九四七年春訪問英國，當他在蘇聯大會上的演說收到巨大的成績時，工黨的領袖們會給華萊士以批評，來掩護社會黨的反動政策。後來才知道：工黨的中央，在同華萊士的代表談判時，曾提出其狡猾的合作計劃，以華萊士必須永遠反對共產黨的政策，與之進行鬥爭為條件。華萊士的答复予以拒絕的答覆。

這樣一來，工黨的部長們，能够證明：他們的外交政策，按其基本內容，滿足了英帝國主義的一切要求，保守黨的任何人，也不能想出或提出比這更加仇視蘇聯的政策來。因為工黨政府的政策，在實質上就是更頑固的保守黨的政策。只不過工黨領袖們的政策所表現的形式，多少有其各自的特色而已。

只要注意這形式，即可明瞭。衆所週知，一些蘇聯的敵人經常向蘇聯狂吠，反對同蘇聯合作。但這不是工黨的維爾家所用的方法。他們甚至不能說經常在言詞上是擁護的，在事實上是反對的。不，他們比這更壞。他們在事實上是反對同蘇聯合作，而在言詞上，是擁護，同時又是反對。

只要注意艾特貝、貝文、莫里遜等僑舌家們平常反蘇講話的措詞，就很容易看出這一特點。他們對於這類題目的講演，經常總是這樣的措詞，例如：僑舌家先莊重地聲明：我們絕對真誠地希望同蘇聯合作。可是，同蘇聯的代表們，不可能進行協商，也不可能合作，為什麼？這時僑舌家們裝模作樣好像要說明存在着意見分歧似的，實際上，他們都開始宣傳其技巧的反蘇捏造。他指鹿爲馬，欺騙聽衆，有時甚至富有經驗的國會聽衆，都羞得面紅耳赤。巧妙的僑舌家們，在其演說的整尾，運用印象深刻的感歎來煽惑聽衆，諸如：「咳！如果蘇聯共產黨不是這樣的話，那末我們大家該多麼幸福。」

如果研究工黨僑舌家們的這種反蘇講演的構成，結論是二分的假仁假義和十二分的非勝中傷。我說這個話，並不是誇讚。因為：第一、這裏所說的現象並不是可笑的，而是可厭的；第二、目前在英國，甚至許多工人組織的負責人，都心平氣和地聽取這種卑鄙的演說。他們聽了而不辨其真偽，因為他們不知道也不研究現代國際生活中的基本事實。

爲了說明真理，除用事實證明，別無他法。不論工黨的部長們怎麼說，事實已說明，工黨政府正在努力建立反對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之國際的政治軍事同盟。雖然工黨在一九四六和四七年還硬說：邱吉爾的方案，並不包含在他們的計劃之內，可是現在，西歐的軍事聯盟，已經產生並正式的宣告成立了，現在貝文正在壓迫斯卑地納維亞諸國，並憤恨瑞典政府對於這個冒險方案所表現之動搖和兩面態度。更使他狂怒的，是對捷克和匈牙利的希望，由於在這些國家內所準備的陰謀之失敗而澈底消失了。但另一方面，意大利的加斯貝利政府，却以其不願執行同蘇聯有關的和平協議的政治傾向，來表示它決心參加適合於美帝國主義之慾望的任何陰謀。此外在西部德國重整軍備，並同德國餘部脫離，準備成爲馬歇爾計劃之主要的軍事戰略基地的基礎。在這整個交易中，希特勒的角色，無可爭論地要給那些在衣袋裏放有金元和原子彈的美國股東保留着。

英國和美國的外交，正在有系統地拾起那一堆陳舊的「反蘇同盟」，其使命顯然不是爲了和平而是爲了戰爭。難道以上這些事實，還沒有說明麼？如果是這樣，那末就可以明白：爲什麼英國工黨，對於歐洲大陸各國國內反動派之增強，經常表現那種可疑的興趣。在分裂工人運動上，在從各國政府中排斥共產黨上，在社會民主黨中壓制左翼的反對黨派上，在推動右翼社會黨同反動政黨的合作社上，在被破壞與兩國的反納粹運動上——在這一切上，都暴露了四方同盟的工黨組織者們，對於加強這一帝國主義大聯合之一切薄弱環節中的反動勢力的內部堅強性之戰略興趣。另一些事實說明：工黨的領袖們，認爲必須在英國本國內進行「肅清後方」。他們開始恐懼，即使在這裏的後方也不可靠。正如美國的杜魯門政府一樣，英國的工黨政府也決定，開始從國家官吏中，將所有的共產黨和所謂「同路人」，亦即是所有不贊同政府之政治方針的人們全部撤職。爲什麼撤換他們呢？因爲他們批評工黨的

政府，或者由於批評目前美國的政策，而表現「沒有愛國心」。或者，雖然並沒有批評，但總是不愛戴當局。就是共產黨和其他「外人」看見了工黨政府在作些什麼這一條就不夠好。最好是避免一切耳目。

這是充分明顯的，誰的心裏有鬼，誰就將左顧右盼懼怕外人的身目。難道說，在英國進行這種清潔，不是事實嗎？當然是事實。可是，英國的勞動者，是否明白這一事實的意義？政治上開眼的人，自然會明白這個，可惜這樣的人，目前在英國還是少數。

例如：某些英國作家，尖銳地斥責工黨政府的這種措施。有名的作家戈爾林聲明道：

「這個聲明，原則上已決定，適應陳腐的杜魯門主義進行反對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戰爭」。我們不知道這個是否已經決定。但問題不在這裏，「無論如何，必須摧毀戰爭販子的計劃！」這種提出問題的英國進步人士，無疑問地正確地了解了時代的趨勢。

可是在英國，有誰能制止戰爭販子的魔手呢？在英國是否有這種力量呢？有的，那就是工人階級——英國人民的基本力量。他不但對於新的戰爭，絲毫不感興趣，相反，他特別關心於和平之保證。當然，如果工人階級不了解時局的嚴重性，或者消極對待日益增長的戰爭危機，而將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讓諸工黨的部長們，那末就有成爲流血戰爭之無謂犧牲的危險。但如果英國工人階級，能警惕注視危險陰謀的戰爭挑撥者，並積極地反對他們，那末，無從開地，對於保衛和平，將有巨大的意義。

或者有人以爲，不論英美局勢如何，當不免要起戰爭，並將英國捲入漩渦。英國作家郭德爾馬沙爾，不久以前曾表示：恐怕「工黨的政治家，將把英國出賣給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作奴僕」，那時這個國家，就能「將我們投入反對我們天然的社會主義敵人的戰爭中」。當然，在美國有力的經濟大享

將黨當中，有那種由于帝國主義的感差和社會恐懼的歇斯頓的，以致使其頭腦尖掉了重心；像希特勒一樣教誘導走向巨大的冒險、侵略和世界戰爭。但英國政府恐怕不能忽略開始戰爭的全部冒險性。特別是，如果他知道資產階級國家（其中包括英國）的工人羣衆已有所準備。

這就是說：保衛和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于英國的反對新的戰爭者，能否充分的提高英國工人階級廣大羣衆的政治覺悟、警惕性和積極性。我確信，今天許多英國工人，甚至對於英美兩國間間的直接軍事合作已進行了何種程度和方式，都沒有實際的觀念，也不去想，這一合作是爲了什麼，爲誰的利益而進行。因此，教育工人，首先是一切有組織的工人，喚醒工人羣衆的良心，幫助他們覺悟到準備新的戰爭，就等於準備那種必須防範的殺人罪行，這是何等的必須和重要。

無論任何情況都必須不能盲目地將有關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託付與像貝文、艾特里及其夥伴的隨心所欲及反覆無定的意見。他們過於欣悅地執行卑無罪惡的帝國主義的慾望，和支持其執迷不悟的思想，同時又過于粗野地忽略了勞動者的利益。顯然，他們已如此盲目地仇視蘇聯，以致使其希望改善蘇英關係的聲明，明顯地和他們的實際行爲相矛盾。特別是貝文，當每一個反對的政府，都必須考慮，同目前在歐洲存在着的兩種不同的制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如何和平共居和合作的時候，而他自己却還在強調其試圖實現「統一的歐洲和保持歐洲爲西方文明（即資本主義）之中心的方案」的決心。有一點是明顯的，那些已經試圖製造「統一的歐洲」和在歐洲建立「新秩序」之政治選手的榮冠和力量，會使像貝文這種人感覺不安的。

但，英國工人及其組織能否有力量來制止有害于和平事業的貝文和艾特里的外交政策呢？工黨的右派頑強地把持着工廠的機構，以及職工總會和許多職工會。衆所周知：右派的領導者藉助于這一機

稱，在每年的代表大會上，正式戰敗了反對派，而在會期的中間，則將個別的工黨左派開除黨籍。因之，一些左派，就失去了勇敢和積極性，因為他們還不能確信，英國工人階級能夠抑制那些實行帝國主義政策之工黨的部長先生們。

這是沒有根據的懷疑。英國的工人階級，在一九一九年，曾經能夠抓住烏吉爾的手，他那時是海軍部長，曾組織了十四國反對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之不光榮的軍事干涉。那時，英國工人組織如此堅強的制壓共有派領袖，甚至如麥克唐納和貝文之流都不得不參加工人的抗議，去反對反蘇的軍事干涉。難道英國工人階級從那時起，在這方面削弱了嗎？不，剛強相反，他是強大了。

一九三一年，當麥克唐納出賣祖國時，工黨組織，曾能激烈的進行反抗。他們將黨的老領導者——麥克唐納打下插台。莫非麥克唐納的叛逆，比之現在的工黨部長們所參加地備的新的世界大戰，還更為有害嗎？

因之，只要所有的堅決反對戰爭的和平誠實反同蘇聯合作的人士，能夠更加密切結合工人羣衆，並鄭重地幫助他們，感到自己在爲和平和工人事業的鬥爭中之天職，那就沒有任何根據，懷疑英國的工人階級不能克盡其天職。

只要放棄成性的帝國主義在世界上還存在的時候，人類對於新戰爭的威脅就沒有絕對的保障。

國際帝國主義已經掀起過兩次世界大戰。而兩次都有一部分人類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之下解放出來。沒有任何根據，想像到同樣的結果，以爲全世界的人民，在第三次就不能夠制止帝國主義的侵略。世界的情形，已經是如此，基于任何人也不能改變的社會發展之毫不容情的鐵則，社會主義用各種的方式，將資本主義取而代之。經驗證明：如我們上面所已說過的，當瘋狂的帝國主義反動派，每

一次爲了消滅已經疲弱的進步力量，準備其「進攻戰」時，反而加速了歷史進步力量之洪流的猛烈傾瀉。

在全世界進行着兩個陣營的鬥爭，到現在誰若還打着「第三者」的旗幟，那末他不是帝國主義反對陣營的秘密代理人，就是政治盲目者，他不久就會看到，他是自己的妥協和外人的收買之可憐的犧牲品。

社會主義和民主的反抗陣營，在以前任何時候，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帝國主義起來反對他，只有確信自己的頭。

讓他們不要忘記：在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陣營之兇惡的冒險計劃的鬥爭中，佔領導地位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各國兄弟友誼之偉大理想的體現者；我們的蘇維埃聯邦。蘇維埃人民，乃是終個進擊人類的將手。那些認爲：如果他們將人類投入遲遲的戰爭中，那末，他們就會走向好運的帝國主義者，真是失掉了理智。我們看，當這種戰爭極端尖銳地，在資本主義千百萬的奴隸大眾和被壓迫的人民面前提出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你是維護或是反對蘇聯？你是維護或是反對新民主主義？你是維護或是反對和平和各國的兄弟友誼？你想要爲何而戰：爲了脫離剝削的自由的主義生活，或是爲了舊的資本主義的奴僕生活？」誰的旗幟將獲得勝利！

可是，我們認爲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勞動者拿出積極的行動是可以防止戰爭的。各國的勞動者，參加堅決地反對戰爭販子及其夥伴，則不承認新的戰爭同社會主義發展的機會更爲多。